

■ 红色记忆

秦鸿钧电台主要负责上海地下党与华中局(后改为华东局)通报。秦鸿钧化装成贩猪的商人，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

先后三次往返根据地。1949年5月7日，国民党特务将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人秘密杀害。

秦鸿钧电台：用生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1949年6月2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庄严宣告：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今日成立。15天后，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上级军管会发来的“008号”电报：“兹于1937年冬，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即李白)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查。”

上海市公安局立刻派专人与李白夫人裘惠英一起查找。3天后，经群众提供信息，他们在上海浦东戚家庙后面的一片空地，挖出了十二位烈士的遗体，烈士的身上弹痕累累。经辨认，他们当中有李白，还有秦鸿钧和张困斋。

淮海战役前后，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蒋介石一面准备了全面撤退计划，一面部署上海的特务头子毛森对中共地下党员、爱国人士甚至无辜群众进行了大逮捕和大屠杀，在上海解放前被毛森杀害的共产党员中，最重要的是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李白，中共上海委机关负责人、秘密电台负责人张困斋，以及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秘密电台报务员秦鸿钧。

一份旧警察的“邀功报告”

经过紧张工作，1949年8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局长吴萍从接管的国民政府卢家湾警察分局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分局巡官史致礼等的“邀功报告”：

“职于今日零时五分，得淞沪警备司令部电讯科员傅若鹏通报，有共产党秘密电台一座，已于前一小时内破获……惜主犯秦鸿钧一名在逃未获……经电示局长，分派警15名协助，职即带警前往……一面派警四加封锁，一面亲率强元贵等警员入室搜查，查获无线电及发报机一具，并秦鸿钧照片一张……后据屋面碎瓦追踪，在该屋外阳台上擒获一人，经核对照片系秦无讹。”这份“邀功报告”不仅反映出史致礼等人确系抓捕秦鸿钧的元凶，而且复原了秦鸿钧的被捕经过。

同时，我公安人员还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档案中另有两个发现，一个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奖惩评议会通报：“巡官史致礼、督士强元贵参加行动有功，各记功一次，其余14名警务队警士予以嘉奖。”另一个是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949年4月15日发出的签发复印件：“协助本部破获谍台有功，颁发奖金金圆券伍万元。”也佐证了已被上海市公安局卢家湾分局留用的史致礼、强元贵等人的罪行。

但李白和秦鸿钧到底是怎么暴露的呢？上海市公安局继续调查。

1950年3月30日，上海货物税局沪北稽征所通过电话向上海市虹口公安分局报告：“有一位中年男子，携带一批军用通讯器材前来纳税，状态极可疑。”经审查，这个叫李树林的人是个履行过登记手续的国民党“在乡军人”，曾加入过军统。通过李树林顺藤摸瓜，我公安人员逐渐摸清，一个叫徐鸣秋的特务是个关键人物。1948年4月，国民党国防部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电讯监察科，徐鸣秋则是二厅上海电监科的副级侦讯员。

大网向全国铺开，徐鸣秋这时已混入解放军某航空处干训大队当教官，但还是被明眼人

检举“教官徐某某有疑点”，经南京军区与上海军管会核对，确认徐某某就是徐鸣秋。1950年7月23日，徐鸣秋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

经审查，徐鸣秋交待，破坏我地下电台的真正凶手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电监科的中校督查叶丹秋。1950年9月18日，叶丹秋在上海落网。

原来，1948年11月，叶丹秋从华北“剿总”调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他是一个有着16年间谍生涯的资深军统特务，双手沾满我地下工作者的鲜血。正是在他主持下，根据我地下电台报务员李政宣叛变后提供的“上海地下电台的工作时间、手法特征、掩护办法”等信息，拟定了侦破我秘密电台的实施方案。

他们安排报务技术尖子，按“四六班”排班，昼夜不息地侦测、监听、记录一切认为可疑的电台信号。确定方位信号后，再携带小型直流通报机缩小范围搜索，从而确定重点搜索区域，终于在这年年底，确定了一个大致范围，并上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调谍报人员马国勋赴沪进行流动测向，经过7天的侦测，确定电台在江湾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一片区域。经过挨家挨户的搜查，12月29日晚，叶丹秋带人逮捕了李白同志。

李白电台遭到破坏后，不能不影响到秦鸿钧电台的工作，虽然李白电台不属于地方党系统，但上海局和上海市仍决定秦台暂时停止发报，只收不发，准备迁址，并研究拟建立一个预备电台。但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确实是来得太快了，上海局和上海市必须和中央保持电讯联系，以便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并接受指示，而预备电台还不能正式通报，秦台迁址一时不能实现。

这时，秦鸿钧主动向张困斋请示，建议领导批准及早恢复与中央通报。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考虑到李白电台已被破坏，秦台的任务就更加繁重艰巨，经研究并检查了各种准备工作，同意恢复通报。

侦破李白电台的“成功”令国民党谍报人员愈加兴奋，在上海四处活动。1949年的3月，他们在卢家湾区捕捉到一个可疑信号，然后又经过四五次反复流动测向，确定方位在打浦桥南新里附近。3月17日夜，秦鸿钧正在加紧传送情报，后门传来了又急又重的敲门声。

秦鸿钧夫人，我地下党员韩慧如多年后回忆：“当时，我立即敲响阁楼的地板，通知鸿钧。这时敌人已经冲上了楼梯，在通往二楼的腰门处大声吆喝‘开门，开门’。我边应着，边尽量拖延时间，但敌人砸开门冲了上来，他们要我打开通往阁楼楼梯的小门，我装作找不到钥匙，门又被他们砸开了。”

韩慧如被敌人拉扯着登上阁楼时，看到秦鸿钧已不见踪影。楼里有拆毁的发报机，一些烧剩的纸灰，天窗前放了一张凳子。韩慧如心里一阵高兴。恼着成怒的敌人吼着：“快跑！费了三个月，别让他跑了！”几个敌人从阁楼天窗跳出去寻找，并朝天开了两枪。

但是，房间没有别的出口，秦鸿钧当时只是躲藏在楼顶的柴草里，当敌人再次登上楼顶搜捕时，秦鸿钧被发现了，夫妻双双被捕。

情况紧急，秦鸿钧没时间设置示警暗号，而3月19日正是他与上级约定的联络日。当天下



秦鸿钧、韩慧如夫妇

午，秦鸿钧上线张困斋如约来到秦家，正想敲门时，发现情况异常，立即转身离开，走到弄堂口，被守候的特务拘捕。

一张记在脑子里的地图

秦鸿钧是山东沂水南乡世和庄村(现沂南辛集镇世和村)人，家境贫寒，1927年沂水南乡的农民运动风起之时，那时还叫秦相猷的秦鸿钧才16岁。他受中共党员葛德孚、贺百珍等人影响，积极参加了农民运动，在葛德孚的介绍下入了党，成为沂水南乡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这批早期的共产党员在世和庄成立了农民协会，迅速在周边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并相继参加和组织了莒县特别支部的建立和“莒沂两县农民暴动”。当年，农民协会在世和庄龙王庙成立时，贺百珍和秦鸿钧在庙前一起栽下了一棵松树以示纪念。

但农民暴动失败了，秦鸿钧被捕，被拘押在莒县城。为了营救他出狱，家里卖光了所有的土地，在党内同志的合力营救下，秦鸿钧才被救出。

1933年夏天，中共山东省委出了叛徒，沂水党组织遭到巨大破坏，沂水党组织开会决定，让暴露身份的党员同志马上转移。不料会议刚结束，抓捕已经开始，秦鸿钧匆匆踏上逃亡之路，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秦鸿钧一路找寻党，从青岛到大连，从大连到哈尔滨。重新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已是两年之后。1936年，党组织决定派他赴苏联学习电台通讯技术。

怎么去呢？组织上给他的不是火车票，不是船票，更不是飞机票，甚至不是介绍信，而只是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上标示着大致的路线，要他根据这条路线，自己想办法穿越国境。这时东北已沦为伪满洲国地区，完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国境线全部被伪军和特务控制着，甚至地图也不能随身携带，只能将地图指示的一切完全记在脑子里。

秦鸿钧背着干粮和简单的行装离开哈尔

滨，通过小路一路向北，向国境线出发了。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他昼伏夜出，还要躲避野兽，就这样经过十几天的艰难行走，他终于越过了边境，到达苏联境内。

秦鸿钧仅仅上过四年私塾，不知代数、不知电学、不懂机械，却要直接学习无线电、电台技术，教课的又是说俄语的苏联人，谈何容易。他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对破旧机器无数次地拆装、修理，终于掌握了这门技术。半年后，秦鸿钧学成回国。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党派秦鸿钧赴上海建立秘密电台。这个电台主要负责我党与第三国际远东局之间的电讯联络。为掩护身份，经组织介绍，他与公开身份为小学教员的韩慧如在金神父路148号一座花园洋房建立了家庭。

这时，秦鸿钧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设在辣斐德路(今起兴中路)和菜市路(今南昌路口)的永益糖果店老板兼跑外(推销员)。他跑外只是偶尔推销糖果，主要任务则是到处寻找组装电台所需的零件，还要不露痕迹地购买。跑了很久，终于拼拼凑凑用旧零件组装成了两部收发报机。有了电台，天线架设在什么地方呢？秦鸿钧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天线嵌设在房子阁楼的天花板内，然后在天花板顶端开一个很小的洞口，天线只从洞口外留出一点线头，工作时将天线接上，工作结束就将天线拔去，既清晰又安全。

到1943年，秦鸿钧电台主要负责上海地下党与华中局(后改为华东局)通报。为了开辟这一通道，秦鸿钧化装成贩猪的商人，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先后三次往返根据地。他根据新台设立的方位，重新调整了频率和呼号，完成了党交给建立地下电台的任务。他还扮作猪贩子冒着风险，从根据地给上海地下党带了一份军事地图，这次任务受到了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嘉奖。

1947年下半年，上海环境日益险恶，为确保电台安全，中共中央上海局开始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系。当时，上海局的电台设在打浦桥南

新里315号的阁楼上(今瑞金二路409弄)，秦鸿钧是报务员。上海局收发报工作和译电是完全分开的，秦鸿钧电台收到电报后，就交给机要交通员送往译电员处，这个机要交通员由秦鸿钧夫人韩慧如承担。译电员译完后，由另一位机要交通员送至中转站。

1948年下半年起，电台工作越来越多，秦鸿钧经常整晚连白天地工作，有时要干到第二天下午。领导决定他不再担任任何公开的职业。于是，他成了“失业者”，生活要靠妻子的薪金。为了维持生计，每天下班后，韩慧如还去找“家庭教师”(接送文件)的活干，秦鸿钧则在家“买汰烧”。

一首没有抄完的歌

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1号牢房里。1号牢房关的大多是要犯、主犯，被难友们称为“死牢”。

时任中共上海北郊区委委员的富华差不多前后时间被捕，被关在4号牢房，成了他们的难友，他于1949年5月25日与韩慧如等成功越狱。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三位令他印象极深、无比敬佩的难友、战友：

“秦鸿钧是4月初被关进来的。那天下午放风之后，准确地说是吃晚饭前，只见一个高个子背着个人进了1号牢房。后来才知道，高个子是秦鸿钧，他背的人叫张困斋，双腿被打断了，血肉模糊。原来，秦鸿钧被捕后，并不知情的张困斋来取情报，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

“第二天早上，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主动挨近他。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秦鸿钧。’他说他和张困斋，还有他的爱人，一起被抓进来了。后来，我们越来越熟悉，不过前后也就二十来天的时间。”

20出头的富华每天都在牢房里唱歌，从早唱到晚，感染了监狱里的所有人。秦鸿钧让富华把歌词抄给他。过了几天，早上起来放风，秦鸿钧把一块大饼分成三份，分给富华等三位难友每人一块，然后说：“这两天很紧张啊，因为每天都往外拉人。看样子我们要牺牲几个了，你怕不怕？”富华回答：“到了菜市口，伸着脖子是一刀，缩着脖子也是一刀。”他听了连连称赞说：“好！好！好！”

5月7日吃午饭的时候，富华没有看见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几位同志。当天傍晚，富华被转移进了1号牢房，他睡的正是秦鸿钧原来睡的位置。第二天，他整理秦鸿钧留下的铺盖时，在木板墙根发现他用铅笔写的几行字：“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这正是富华曾抄给他的《跟着共产党走》的歌词。因为没有灯光，字迹歪歪扭扭，有的大有有的小，而且没有抄完。

在狱中，国民党谍报部门的打手们用木棍毒打李白、秦鸿钧、张困斋，动用各种刑具，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肥皂水，拔指甲，但一切都是徒劳的。1949年5月7日，国民党特务头目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示，将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20天后，上海解放。

1950年4月28日下午，在交通大学礼堂举行了“李白、张困斋、秦鸿钧三烈士追悼大会”，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主祭致辞，向各界代表庄严宣布：“过去逮捕英雄的匪特，今天已被逮捕了！”一千多名与会者用长时间的掌声，告慰九泉之下三烈士的英灵。1951年1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叶丹秋死刑，立即执行；史致礼、强元贵等其他有关罪犯亦被判处有期徒刑。

1958年，经李克农同志向党中央提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李白的事迹为原型，参考秦鸿钧烈士、张困斋烈士的事迹，拍摄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一缕青烟随风去

1931年11月19日早上，不到8点，在南京的徐志摩同何竞武一块吃过早点后，匆忙给林徽因发去一个电报，告知对方下午3点能准时到达北平南苑机场，让梁思成去接机。随后，他便登上了中国航空公司飞行京平线(南京-北平)的“济南号”邮政飞机。

徐志摩之所以能够登上这么一个邮政飞机，一是“赶点”——不耽误为林徽因当晚的中国建筑艺术沙龙捧场。二是兜里有一张中国航空公司财务部经理保君健赠送的机票。

徐志摩乘坐的飞机，是一架史汀生“底特律人”(Stinson Detroit)JSM-1F型单发动机机座上单翼飞机，由美国史汀生飞机联合公司制造。

中国航空公司在所开航线上享有10年的独占航权，因此开办初期以运载邮件为主。7名正驾驶员中，6名是美国人，只有王贯一人为中国人，这主要得益于他多年的驾机经验和曾经参加空战的特殊经历。

1931年4月15日，从南京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的“京平线”航线正式开通。

而这条4月份刚刚开通的航线，正是7个月徐志摩搭乘的航线。飞行员王贯一和副机师梁璧堂，二人都是南苑航校三期的毕业生。飞机上除运载40磅2000多封信件外，乘客仅徐志摩一人。

飞到济南党家庄上空一带时，一直晴空万里的天突然变得大雾弥漫，在当时的导航还需要目视标志物的情况下，为寻觅航线，飞机降低飞行高度，不慎撞上济南长清的开山山顶，霎时间机身粉碎，机油四溢，轰然起火，坠落山脚。

对于儿子的遇难，王朝臣震惊悲伤之余，也对这次空难的责任提出了质疑。他对媒体说：“贯一为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此次实属意外。我亲赴开山党家庄调查，结果发现‘济南号’飞机并非触于山顶，系汽缸渗漏，机机无从发现，且由徐州开时，总公司报告济南天气迟误，致此有变，责任应该由公司负之，或不得已而与公同诉之法律。”

“济南号”飞机的失事，直接导致这条从南京经徐州、济南、天津到北平的航线于1931年12月25日彻底停航。

我们在纪念徐志摩的同时，不能忘记还有这样一位中国航空的先行者，他的生命定格在39岁——一个人年富力强的最好岁月。然而，他的一生，犹如一道划过天际的彩虹，虽然短暂，但光彩斑斓。

■ 名流影像

1931年11月19日，随着茫茫雾气中的一声巨响，一架飞机在济南西郊一座山头燃起熊熊大火。

在这次飞机失事中，与著名诗人徐志摩一起陨落的，还有一位39岁的中国第一代民航飞行员。

王贯一：划过天际的一道彩虹

□ 宫玉河

1931年11月19日，随着茫茫雾气中的一声巨响，一架飞机在济南西郊一座山头燃起熊熊大火。著名诗人徐志摩就在这次飞机失事中，“轻轻的走了”，年仅36岁。飞机的驾驶员也同时罹难。这位与徐志摩一起陨落的飞行员，就是王贯一。他是中国航空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代民航飞行员。

出生“大户”家

王贯一，字昔吾，1892年出生在平原县城外东7.5公里的弹丸小村——前曹镇南官村。

据现年87岁的老人官付堂回忆，小时候，村子周围有已成残垣断壁的圩子墙，有东、东北、南、西、北几个门。村里大约有百十户人家，400多口人。多数姓官，土来户姓王，一户姓张。村里有大约12顷地，多属王家。王家人少地多，雇有长工。王家不但在土地上属于“大户”，在外地工作的人也多，知识分子多。当时在南京、重庆、北京、济南、青岛都有王家人。

王贯一的父亲叫王朝臣(字巨卿)，为清末进士，民国初期做过济南的教育局长(老宅为济南老城后坡的二层小楼)。

王朝臣兄弟六个，“朝”是辈分，“朝”字辈的后代一律用“一”作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王贯一的名字由此而来，取“一以贯之”之意。

七年陆军军校生涯

王贯一在学习飞行之前，是按照当时的军事学校教育体制，一路沿着陆军小学、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的路径一路走来的。

1911年，王贯一到了确立“职业生涯”的关键

时刻。经过私塾教育、文化程度不低的他，很幸运地搭乘上了山东陆军小学堂(清末山东政府培养初级军事人才的学校)最后一次招生列车。

山东陆军小学堂设于老济南南关附近。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九月开学，计取正额70名，附课10名。此数额是依据练兵处规定，“小省学生定额210名”，每年收生三分之一，三年收足。学堂初建楼房6座，以礼乐射御书数命名，每楼住一队，每队分配一间讲堂。进入陆军小就要养成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以及其他各种武德。课程分一般学科与军事学科。民国后，该学堂也随之停办。

经过3年的陆小学习，1914年，王贯一以优异成绩进入陆军第一中学堂。

陆军第一中学堂宣统元年开办，设于北京清河镇，距清华园数里，堂舍多为新建楼房。陆军中学教育是陆军小学教育的继续，如小学有数学一门，至中学则有代数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多门。

1916年，王贯一又顺利进入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习称“保定军校”)，步科五期四连。到1918年4月毕业，王贯一终于完成了长达7年的陆军教育历程。随后入边防第三师任连长，开启了自己仅有两年的陆军生涯。

此时，正是烽火连天、军阀混战的北洋时代。一直到离开陆军，王贯一一直跟随边防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参加“援湘战役”。

南苑航校三期学员

1920年3月，南苑航校第三期开始招生，王贯一便脱离陆军边防第三师，步入航空生涯。

1911年辛亥革命，翌年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聘请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百里索为总统府顾问。百里索向袁世凯建议购置飞机，开办航空学校，训练飞行员。作为创办空军的基

础。袁世凯很赞赏，遂专项拨款6万元，财政部拨款270万元，交北洋政府参谋本部办理。参谋本部决定在北京南苑兵营司令部旧址就近设立航空学校。

1913年9月，航空学校开始面向陆、海军各机关部队的现役军官、军佐选拔飞行员60名，年龄在25至30岁，学员的官阶，中尉至少校。9月底第一期学员报到入校，航空学校正式开学。学员大部分为陆军学堂毕业生，学习期间带原薪，学校另加10元补贴。1915年9月，第一期学员中41人毕业。学员毕业后，随即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的战斗。

王贯一入选南苑航校第三期飞行生。这期间共招收了50名学员，本来学制两年，但因故延长到1923年4月12日，40名学员毕业。毕业典礼特别隆重，由黎元洪总统亲自主持。为此，永定门通南苑的大道派工程队连夜赶工，由卢沟桥运来细沙黄土，趁湿铺设，使汽车马车扬不起灰尘。典礼上有飞行表演，看得黎大总统连连称奇叫绝不已。

乱世类转蓬，流离军阀间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中。中国早期空军还不独立，是依附于军阀和陆军的军种。作为空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像墙头草一样，随风来回倒。

1923年4月南苑航校毕业后，王贯一在保定航空学校任教官。

1924年，吴佩孚接受美国的援助，由美国人帮助组织和训练空军，并向美、英两国借款，扩建空军。此时，作为原边防第三师“老部下”的王贯一，转而由保定航空学校再次来到吴佩孚手下，担任“直鲁豫巡阅使司令部航空队长”。

1924年10月下旬，第二次直奉大战正酣，直系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部，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致使直军一败涂地，奉系和冯玉祥共同接管北京政权。

在保定的航空教练所，被国民军第三军接收，成立了国民第三军航空司令部，由王贯一任飞行队长。

1925年秋，吴佩孚在汉口复出，由靳云鹏、寇英杰率部从湖北攻入河南，联合奉系的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先后打败岳维峻、孙岳部，从孙岳手中夺回了空军，在洛阳重新编成直系航空司令部，王贯一就此“归队”直系。

1926年，褚玉璞被张作霖任命为直隶督军。这年冬季，在保定成立了直隶航空司令部，王贯一任副队长。

1928年冬，阎锡山控制了平津。1929年9月1日，阎锡山把航空机关全部并入航空学校，扩大学校组织，包括保定在内的京津地区，已经属于北伐军阀阎锡山的地盘。王贯一作为不可多得的高级航空业务，于明春(1929年)间先行开通沪汉之间的商业航班。

从空军到民航飞行员

20世纪20年代末期，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奉系军阀的“易帜”，中国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

1928年11月1日，结束多方力量尤其是军方力量的中华航空协进会成立。同月，该会向《申报》记者言，股金三十万将筹齐，欲购机四架，大力开展民航业务，于明春(1929年)间先行开通沪汉之间的商业航班。

1929年5月，沪蓉航空线管理处成立。作为多年的空军飞行员和与军方多有关系的王贯一，随即离开山西航校成为沪蓉航空飞行员，也是中国第一批民航飞行员。1930年7月，沪蓉航空管理处与中国航空公司、中国飞运公司成立新的纯中国血统的中国航空公司。伴随着改制，王贯一成为新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